

# 人工智能赋能师德建设：可为、难为与应为

冯永刚 吕鑫源

**摘要：**人工智能能够有效助推新时代师德建设，对于师德认知的发展、师德情感的激活以及师德行为的调控具有重要的正向价值。但另一方面，人工智能在教育中的应用也给师德建设带来了挑战，具体表现为师德主体角色的“机器僭越”，师德教育的“离身陷阱”以及师德评价的“量化危机”。为应对这些挑战，应激发主体自觉，塑造师德涵养的关系结构；依托智能优势，聚焦师德教育主体；高扬价值理性，厚植师德评价的人文精神底蕴。

**关键词：**人工智能；师德建设；高素质教师队伍

人工智能是引领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正深刻改变着人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和学习方式<sup>[1]</sup>。聚焦教育领域，随着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人工智能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已是大势所趋。人工智能赋能师德建设已成为学界的一个重要探索议题，师德建设在人工智能时代不仅没有过时，反而应该受到格外重视。优良的师德是人机协同背景下教师职业存在和专业发展的根本遵循。在人工智能时代，师德为先的理想信念依旧适用，而且需要在教师教育培养目标中得到进一步强化。因此，如何顺势而为、借势而进、乘势而上，有效应对人工智能对师德建设所带来的机遇与挑战，廓清人工智能之于师德建设的可为、难为与应为，探明人工智能赋能师德建设的价值、困境及纾解之道，以期在智能化的时代环境中助力教师良好师德的养成，实现人工智能赋能新时代师德建设的健康发展，是值得我们深入思考的重要课题。

## 一、可为之处：人工智能赋能师德建设的价值意蕴

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重申，要加强师德师风

建设，培养高素质教师队伍，弘扬尊师重教的社会风尚。推进人工智能时代师德建设的长效发展，促进人工智能赋能师德建设研究规范化、科学化开展，需要我们明确界定师德与师德建设的基本概念，廓清关于这些概念的认识误区。关于“师德”概念之界定，学术界并未形成较为统一的意见，但总体可以分为广义与狭义两大类别。从广义上讲，师德指的是教师职业道德，其不仅涵盖教师的职业道德，也涉及教师在工作之外的私德领域。比如，苏联教育学家契尔那葛卓娃等人在《教师道德》中指出：“教师道德是彼此处于一种复杂的相互关系之中的一般规范和个别规范、规则和习惯的体系。”<sup>[2]</sup>也就是说，师德不应当单单适用于教育教学这一时空场域，而应当包含教师对自己、对职业、对社会、对儿童等所要担负的道德要求和道德规范；从狭义上讲，师德被认为是教师职业道德的简称，其适用范围被框定在教师职业活动领域。王正平在《教育伦理学》一书中提出，教师道德是职业道德的表现形式，并将教师职业道德解释为“教师在从事教育劳动过程中，形成的较为稳定的道德观念、行为观念和道德品质的总和”<sup>[3]</sup>。为了加强研究的针对性和指向

冯永刚，山东师范大学教育学部副部长，教授。

性，本研究的师德指的是教师的职业道德，是教师在教育教学过程中所应具备的较为稳定和和谐的道德观念、道德情操、道德行为等的综合。顾名思义，师德建设则是指为了使教师形成师德认知、师德情感及师德行为而采取的一系列长效建设举措，是为了使教师达成爱国守法、爱岗敬业、关爱学生、为人师表等目标而实施的系统性培养体系。

在人工智能时代，师德以及师德建设尤为关键和必要。首先，在智能时代，智能工具的知识容量以及知识获取速度已然超越人类，教师地位正遭遇前所未有的冲击，这也引发了教育相关者对于人工智能代替教师的担忧。然而，“目前运用于教育领域的人工智能只能遵从既定算法行事，本身无法产生道德或道德律。”也就是说，师德领域是人工智能所无法企及、不能到达的范畴。由此，积极推进师德建设是人工智能时代彰显及提升教师“不可替代性”的有效举措。其次，伴随着智能技术与教育的深度融合，师生主体可能遭遇数据和技术的僭越，陷入技术所塑造的“美丽新世界”中无法自拔。甚而，在智能机器的裹挟之下，教育可能过度关注人才培养的效率，而走入功利主义的危境。此时，具有人文气息的师德扮演“调节者”的角色。高尚的师德能够发扬教育的价值理性，进而为教育保温，为技术立心。积极推进师德建设则可以带领教育走出技术理性的泥潭，使教育回归正确的育人轨道。

每个时代的教育都带有那个时代的特征，这对师德建设来说亦不例外。同时，人工智能也为师德建设提供了诸多新机遇。具体而言，人工智能在助力师德认知、师德情感和师德行为的养成方面具有不可忽视的重要价值。

### 1. 为师德认知发展拓宽学习场域

师德认知是师德养成的基本前提，其在师德建设中的地位是毋庸置疑的。师德认知亦称师德认识，指的是教师对于师德价值、师德规范、师德现象等的认识、理解、评价与判断。依托人工智能时代的诸多智能技术，教师的师德认

知拥有了更加良好的学习场域，其广度与深度在很大程度上得以拓展。

首先，人工智能技术为师德认知发展创设了更具广度的学习场域。伴随着互联网、通信技术的发展，师德学习空间不再拘泥于物理空间，而是形成了线上与线下相耦合的全域性场域。教师能够利用微信公众号、慕课共享系统等平台随时随地获取师德认知。在虚拟增强技术等应用于师德建设之后，虚拟学习空间的构建更加拟真化、沉浸化，教师在其中取得的师德认知则更为真切有效。其次，为师德认知形成提供更易内化的学习场域。教师不仅需要明晓爱国守法、爱岗敬业、关爱学生、教书育人、为人师表等的师德要求，而且需要将这些要求“内化于心”，成为自身的价值追求。人工智能为师德学习的方式转型带来了新的契机，其能够通过一系列智慧化的工具为师德认知提供更易于内化的学习场域。比如，智能交互技术所具备的现实复刻能力，可通过临场性的方式为教师提供包含文字、图像、音视频等在内的复合形态的学习内容，给个体带来视觉、听觉等多维感官体验；另外，智能算法能够在把握个体话语轨迹的基础之上，分析其价值取向和思想偏好，为教师推送符合其需求和兴趣的话语内容，使教师在学习环境中能够更加主动地吸收正向的师德认识。

### 2. 为师德情感激发提供共鸣条件

激发教师的师德情感，是师德建设的旨归之一。所谓师德情感，指的是教师在师德实践过程中所形成的道德情感体验，是教师道德学习的原始动机以及师德素质形成的催化剂。师德情感连通了师德认知与师德行为，其在师德建设中必不可少。“道德作为人类的一种特殊知识，并不只依赖于理性化的知识传播，而是更多地依赖于人类感情纽带的共鸣”<sup>[4]</sup>，而智能化的师德榜样宣传能够为情感共鸣创设良好的条件，进而促使他们形成真实强烈的师德情感。

道德呈现有两种形态：一种是文字形态下的道德，即通过文字表达出来的道德理论、规

范、条例、箴言等，另一种是活动形态的道德，即以行动注解的道德<sup>[5]</sup>。而对于师德榜样事例的宣传，就能够使“行动注解的道德”得以彰显。榜样宣传是师德宣传的重要内容，传统的榜样宣传方式往往只能依托文字这一形态，但囿于文字的局限性，很难使教师与模范典型产生情感上的共鸣，进而阻碍着师德情感的激发。在人工智能时代，榜样宣传拥有了更加多元化和创新化的方式。例如，依托生成式人工智能的音视频以及情境生成功能，模范教师的先进事迹能够借助更为生动真实的方式得以还原。通过沉浸式的观看与欣赏，抑或通过“虚拟榜样”产生的交互，教师能够在心灵深处与模范教师产生共鸣，进而生发更为深刻的师德情感。亦如，依托智能技术赋能的师德榜样宣传，教师能够在高度拟真的虚拟空间中感悟师德典型事件、行为背后的道德动机与情感，在潜移默化的虚拟交互中体验大师风范，接受情感熏陶，设身处地感受典范教师高尚的师德品性，进而激发仿效的道德动力。

### 3. 为师德行为调控创设监督情境

道德实践需要一定的道德行为表现出来，师德行为是教师思想、道德意识的外在表现，是个体在一定的师德认知、师德情感、师德意志的支配下所做出的实际行动。师德行为作为师德认知、师德情感的显性呈现，其在一定程度上代表着一个教师的整体师德水平。教师师德行为的养成需要主体努力和外界力量的共同作用。而大数据等智能技术在社会的广泛推广，为师德行为的养成创设了良好的监督情境和他律力量。在人工智能时代，整个社会日益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数据采集、存储、处理、传输能力空前强大，人们的一举一动几乎都处在“聚光灯”之下，无处遁形<sup>[6]</sup>。也就是说，伴随数据收集与处理技术的纵深发展，教师原本的物理空间被重塑为一个全息数字空间，其中“密布”着摄像头、人脸识别、指纹识别、GPS定位等智能设备，无时无刻不在收集着个体的行为信息。在数据高度互联的人工智能时

代，各种智能设备如同“眼睛”般观察并调整着教师的一言一行。此外，在人工智能时代，每个人都能够以“匿名”身份充分表达自身的意愿、不满、意见和建议，这同样为规范教师的师德行为提供了重要的渠道。如今的很多学校都已经开通师德失范线上匿名举报通道，学校在取得这些举报并考察证实之后，就会对相关教师进行处理处罚。通过这一渠道，能够进一步推进教师良好师德行为的养成。

## 二、难为之境：人工智能赋能师德建设的风险检视

依托人工智能的技术条件，其能够提升教师师德认知、师德情感，促进其师德行为的养成。但我们也同时看到，在人工智能赋能师德建设过程中，亦存在一系列潜在风险，使师德主体角色、师德教育与师德评价陷入一定程度的难为之境。

### 1. “技术依赖”与师德主体角色的“机器僭越”

师德是教师的道德，教师是师德的主体<sup>[7]</sup>。师德建设需要教师自主追求师德之养成，彰显“师之为师”的主体品格。但在人工智能介入教育领域之后，教师在师德建设中的主体角色却遭遇“机器僭越”的风险。面对智能化、技术化和自动化的“红利”，一些教师可能陷入技术世界而不自知，遗忘自身在师生关系中的师德主体角色，沦为“无个性特征的机器”，导致道德主体性的迷失，严重影响着师德建设的长效发展。

首先，师德主体追求的消弭。在人工智能时代，囿于智能技术功能的强大性及其应用于教育的泛在性，一些教师对技术的依赖性较强。尤其是在 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被普及应用之后，教育者更有可能陷入技术之中无法自拔。教师对于技术的“过度沉迷”，会使其道德需要与价值共识在智能化的侵蚀下发生异化，自身的师德追求在技术本位中逐渐淡化，最终

导致教师师德发展的自主意愿趋于消弭。

其次，师生交往中主体角色的迷失。师德养成的基础是把教师视作关系性的存在，换言之，师德养成是在教师与学生的共处中实现的。然而，随着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普及，教师在师生关系中的主体角色被掩盖，导致师德养成丢失了最基本的交互场域。具言之，“人对人工智能的依赖度不断加深，更有甚者将人工智能作为自己学习、工作的必备条件，进而将人工智能神化。”<sup>[8]</sup>而这种对于智能技术高度的依赖使得师生之间面对面的交往被化约为数字化交往，在教师视角下，学生被物化为一组数据，在学生视角下，教师成为机器的一部分<sup>[9]</sup>。随着人工智能在教育领域的全面普及，大大减少了师生间“在场”交往的频率，亦瓦解了传统的信任关系，加剧了师生交往的不确定性，使教师在丢失师生交往主体角色的同时也丧失了培育师德的优渥土壤。

## 2. 师德教育的离身困境

师德自主学习固然重要，但师德教育亦不可或缺。师德教育是师德养成的关键环节，师德教育是助推我国师德师风建设开创新格局的源头活水，其在师德建设中具有基础性地位。在人工智能时代，师德教育得以革新，并在形式方面日趋多元化和智能化。身体作为教师最原始、最真实的要素，是师德发展的核心向度。然而，在人工智能背景下，师德教育可能陷入离身困境。

首先，智能时代的师德教育内容可能离身于教师的德行实践。基于人工智能在资源快速查找、收集、获得方面的优势，相较于过去，如今的师德资源能够更加轻易便捷地获取，但这也导致师德资源的遴选变得随意。由于网络资源的“易得性”，一些学校可能不加考虑地从网络上搬运各类师德资源。这就导致呈现给教师的师德资源往往表征出两个极端。一类资源将师德无限拔高，将教师“神化”为一种高高在上的师德形象，成为一种象征性的身体存在，甚至可能隐含以牺牲教师生命或身体健康来彰显师德之高尚

的内容；另一类资源则是将极少数的失德标签贴到整个教师群体身上，通过媒体所报道的师德失范现象来“规训”“约束”教师，致使更多默默无闻的普通教师倍感心寒。但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都离身于教师的现实德行实践。

其次，人工智能驱动的师德教育方式可能离散于教师的具身体验。身体之体验对于师德之养成而言价值非凡。师德教育不仅仅是抽象概念的获取，更是一种身体直接参与其中的体验活动。在智能时代，信息技术与师德教育的联系愈发密切，线上师德教育趋于普遍。但线上师德教育使处于虚拟世界中的教师很难获得“身体在场”之感，也就无法生发具身之体验感。此外，基于人工智能“操作主义”的运行逻辑，看似智能个性的师德教育活动亦表征出程序化和单向化的倾向。这时，师德教育就走向了“无感状态”，更遑论激发教师的身心共鸣。

## 3. “数据至上”与师德评价的“量化危机”

师德评价是评价主体根据一定的教师道德准则对于教师的综合品质以及行为进行价值判断，以表明褒贬态度，扬善弃恶，促进师德发展的特殊活动。师德评价是师德建设全过程的“指挥棒”，是衡量师德建设成效的关键环节。虽然基于证据驱动的师德师风监测，是教育管理者提高师德管理与评价科学性、实效性的有力手段<sup>[10]</sup>，但在人工智能为师德评价提供证据的同时，也会使其陷入量化主义的泥潭。这种“数据至上”的师德评价将不利于师德建设。

一是框定教师的道德发展空间。数据化的师德评价更加看重的是教育者能够被测量的外显性的师德行为，而教师的情感、认知、思维等重要信息则被剥离在外，抑或降维成可以操作的指标。一如学者的洞悉，智能时代的实证主义习惯于描述个人层面的“行为”和“认知”，却看不到解释主体的“关系”和“生活世界”。这时，多向度的师德发展被框定在机器所设定的指标体系当中，以师爱与师责为核心的崇高师德被物化为技术理性的附庸，教师道德发展受到一定程度的制约。

二是加剧教师的功利主义行为。基于人工智能的量化师德评价,往往只能评价外部的表现与结果,难以关注到评价对象的内在发展。外在评价在根本上是一种功利性评价,目的在于快速获得评价的结果,用于某种外在的目的。而一部分教师为了获得满意的评价结果,可能会做出为评价而表现的功利主义行为,比如,编造虚假数据,抑或发表无所考证的功利性言论。长此以往,师德沦为追名逐利的工具,偏离了师德建设的轨道与初衷。

### 三、应为之策:人工智能赋能师德建设的应然进路

在人工智能时代,智能技术与师德建设的深度结合是历史必然。而探析人工智能赋能师德建设的相关风险,并非否定人工智能之于师德建设的意义,而是意图使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于师德建设。任何技术从发明走向成熟都需要经历一个批判的过程<sup>[11]</sup>。由此,我们需要做出相应的对策,以推动人工智能赋能师德建设的提质增效。

#### 1. 激发主体自觉,塑造师德涵养的关系结构

技术之所以可以作用于教育,恰是由于技术的潜力都是由人来实现<sup>[12]</sup>。由此,只有确立教师在师德修养过程中的主体性与能动性,才能达成师德建设的长效机制,这既需要教师在“人机交互”中唤醒高度的师德主体自觉,亦要求在智能化背景下塑造师德涵养的关系结构。

一是要唤醒主体的高度自觉,在和谐的人机关系中涵养师德。教师对于技术的过度依赖,导致“人机关系”产生畸化,教师在师德方面的追求发生异化。技术始终都要服务于人,而不是损害人类,这是最基本的伦理原则。若想人工智能更好地服务于师德建设,需要唤醒师德主体的高度自觉与追求,明晓“人机关系”的边界,笃定师德追求在数字化时代“不变”的使命,拨开技术的“迷雾”,划清人机交互的边界,持续激发师爱与师责的本能。

二是要在主体的“直接交往”中涵养师德。在技术的开发与应用方面,我们需要将数字孪生、ChatGPT等智能技术充分运用到教育特别是师生交往之中,为教师带来全景式的社交感知体验,使教师面对的是鲜活灵动的身体形象而非单调静止的图像符号,进而在“直接交往”中缩短教师与学生之间的距离感,强化教师的师德情感投入,构建师生之间的和谐关系。另外,教师亦需要加强与学生现实性的沟通与交流,充分了解学生的基本状况和真实生活,增加与学生交往的频次与时间,并通过师生主体的“直接交往”带动师德水平的提升。

#### 2. 依托智能优势,聚焦师德教育主体

随着人工智能的引入,师德教化虽在资源整合和媒介创新方面有所发展,但容易陷入离身困境,影响了其本应发挥的成效。身体哲学和身体主体理论认为,人更多是作为“身体一主体”的存在,人的身体主体性是不应被忽视的。对此,我们不能丢弃时代本身的智能优势,需充分利用人工智能的个性机制与技术条件,聚焦师德教育主体,激活身体之共鸣与能动性,从而复归教师主体的整全样态。

一是加强个性定制,设置引起主体共鸣的师德教育内容。人工智能在师德资源的检索与整合方面具有前所未有的技术优势。鉴于此,我们需要加强对于师德资源尤其是师德榜样资源的个性定制,使师德教育内容充分引发主体共鸣。人工智能赋能的师德教育,其内容应立足于教育者差异化的道德需求,以此为不同的道德发展阶段或者个性品质的教师提供适切的师德学习内容和师德示范案例。基于数据画像系统和云计算体系,人工智能能够充分把握教师现有的道德诉求和道德发展水平,并据此实现师德教育内容的“精准分层”。通过内容的个性化定制,师德教育会更为贴合教师的身体经验、生活活动与生活世界。

二是依托技术条件,采用调动主体体验的师德教育方式。具身认知理论认为,体验是我们具身系统中的“默认设置”,其根植于我们

的身体。依托人工智能的技术条件,我们能够通过“鲜活”的师德教化方式,使身体体验“嵌入”师德教育中,使教师积极主动地参与到师德教育的全过程。比如,可以通过智能技术为教师创设一个与现实世界高度耦合的拟真空间,使他们以“虚拟身体”同张桂梅等模范教师进行互动,似现实世界般感受大师风范,激发前进动力;亦如,可以将 ChatGPT 等生成式人工智能应用于师德教育之中,通过教师与人工智能的对话交流增加教师参与的积极性与主动性,提升身体的体验感。

### 3. 高扬价值理性,厚植师德评价的人文精神底蕴

在师德建设中,师德评价的终极目的是助力教师的师德养成与发展。但在人工智能背景下,“数据至上”的师德评价框定了教师的道德发展空间,加剧了教师的功利主义行为以及违背了评价本身的公平性。由此,师德评价既需要为数据主义祛魅,强化师德评价的多维性,亦需要高扬价值理性,明确“为了教师发展”的价值导向。

第一,提升师德评价的全面性和准确性。为了走出唯数据论的师德评价,我们需要重新审视师德评价。其一,应将自然观察、访谈调查等质性评价与量化评价有机结合,将智能评价同教师评价、学生评价、专家评价结合起来,进而综合、客观地刻画评价对象的真实道德形象。其二,虽然智能技术难以对师德的内隐部分进行直接评判,但可利用智能工具即时获取教师课堂教学和师德培训的实时性状态,考量教师在师德学习、师德反思中的渐进过程,进一步提升师德评价的整体性、全面性和过程性。

第二,高扬价值理性,遵循师德评价的教师发展逻辑。智能时代的师德评价应充分彰显师德建设的价值理性,坚守以人为本的评价逻辑。其应在借助多种智能技术提升评价效率的同时,明确“促进教师之发展”的终极价值导向,将教师发展逻辑嵌入到师德评价的数据收集、

存储、结果分析等全过程,让师德评价焕发生命光辉,避免工具理性下主体与客体间关系的错置或翻转。

#### 参考文献:

- [1] 习近平向国际人工智能与教育大会致贺信 [N]. 光明日报, 2019-05-17 (1).
- [2] 契尔那葛卓娃, 契尔那葛卓夫. 教师道德 [M]. 严缘华, 等, 译. 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1982: 69.
- [3] 王正平. 教育伦理学 [M].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88: 3.
- [4] 万俊人. 美德伦理如何复兴? [J]. 求是学刊, 2011, 38 (1): 44-49.
- [5] 王淑芹. 伦理与德性——王淑芹学术论文集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19: 48.
- [6] 金东寒. 秩序的重构: 人工智能与人类社会 [M]. 上海: 上海大学出版社, 2017: 49.
- [7] 张家军. 论师德建设的教化、内化和制度化 [J]. 课程·教材·教法, 2015, 35 (7): 108-114.
- [8] 冯永刚, 席宇晴. 人工智能的伦理风险及其规制 [J]. 河北学刊, 2023, 43 (3): 60-68.
- [9] 苏明, 陈·巴特尔. 人工智能教育伦理的多维审视——基于马克思技术批判和人的全面发展理论 [J]. 西南民族大学学报 (人文社科版), 2019, 40 (11): 223-228.
- [10] 张艳国, 钟成海. 师德师风监测: 理论、方法与实践探析 [J]. 中国大学教学, 2025 (1-2): 92-102.
- [11] 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 第一卷 [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775, 16.
- [12] 许良. 技术哲学 [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4: 224.
-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重点项目“中国教育制度与标准研究”(AGA250025)]

[责任编辑: 周晓燕]